

## 兩種自由主義和台灣的未來

◎ 黃光國

錢先生這篇論文的題目是〈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：兩種政治價值的反思〉。在這篇文章中，錢先生首先從歷史的角度，簡要回顧台灣社會中國族主義取代自由主義論述的過程，然後討論國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在政治價值和國民身分理念上的分歧。整體而言，錢先生對自由主義在台灣社會中的未來是相當悲觀的。他在文中的「結論」中說：「自由主義在台灣的形式微，與其埋怨國族主義的致命誘惑太強，不如歸因於自由主義者本身缺乏思想的資源、歷史的覺悟、以及道德的承擔和自信。這種自由主義，在台灣社會開始反省五十年來積累的政治價值信念之時，所能做的貢獻，恐怕也相當的有限。」

我同意：在台灣社會中，錢氏所說的「自由主義」的確是根底淺薄。這種「自由主義」在台灣社會中的未來，恐怕也正如錢先生所說的那麼悲觀。要說明這一點，我們必須先看

錢先生理想中的「自由主義」到底是指什麼。在這篇文章中，錢先生指出：「相對於國族主義，自由主義的關懷迥異。由於著重個人，它會抗拒集體性的目標和價值；由於信仰社會的自主，它會反對政治力由上而下的整合模式；由於強調多元，它會挑戰「人民」、「民族」、「生命／命運共同體」這類整體主義的建構；由於對權力的疑懼，它會要求以分散、制衡、限權為特色的體制；由於擔心統治者取得道德權威，它也會提防旨在表達民意的制度（例如選舉、公民投票）淪為提供正當性的工具。」

從這段論述裡，我們大致可以看出：錢先生所說的「自由主義」，是以西方個人主義作為基礎的「自由主義」，其目的在於爭取個人的權利。對於東方社會而言，這種類型的「自由主義」根本是一種異質文化的產品，是很不容易成長茁壯的。台灣近代史上所出現的「自由主義」，大多是以儒家傳統知識份子的抗議精神作為精神支柱。他們追求的價值理念是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，「當不義則爭之」，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；而很少論及個人的權利。在追求國家現代化的前提之下，他們也可能引入西方的自由主義。可是，他們之所以會零零散散地引入西方「自由主義」的思想，主要是因為這種思想可以做為他們對抗統治者的工具，而不是他們對這種「個人主義」的價值理念有什麼道德上的承諾。

這種類型的自由主義，狄白瑞稱之為「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」，它們本來就容易跟各

種不同類型的「國族主義」互相結合，而捨棄它們對西方「自由主義」所做的承諾。錢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所感嘆的現象：「許多在威權時代尚保有幾分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，今天紛紛離開自由主義的啟蒙立場，或者投入台灣國族主義的溫馨懷抱，或者滑進後現代的化妝舞會，也不乏向中國民族主義回歸者。」其實便是出自於這樣的心理特質。

然則，「自由主義」在台灣社會中的未來，是不是不管其類型為何，通通都像錢先生所想像的那麼悲觀呢？我看也不盡然。在我看來，今天台灣社會中之所議會出現「國族主義／自由主義」之間的分歧，並導致自由主義的式微，主要是肇因於「台灣國族主義／中國國族主義」之間的強烈對抗。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，在「想像的／實際的」外來威脅之下，他們一定會產生出「國族主義」的集體意識，並壓制住自由主義的滋長。對於台灣社會而言，所謂「想像的／實際的」外來威脅，在兩蔣時代，是大陸的「共產政權」；在李登輝時代，則是「中國民族主義」。只要「台灣國族主義／中國國族主義」之間的對抗獲得消解，錢先生論文中所說的那種「國族主義／自由主義」之間的分歧，也將隨之消逝。有些知識份子會繼承他們所謂的「自由主義傳統」，有些知識份子會引入西方自由主義的論述，讓自由主義在台灣社會中繼續成長茁壯。

然而，在可預見的未來，「台灣國族主義／中國國族主義」之間的對抗，是否有獲得

消解的可能？在我看來，這個問題的答案應當是正面的。一九九八年六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，和江澤民會談之後，於該月三十日在上海宣布「新三不政策」，明確表示：美國「不支持台灣獨立，不支持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，不支持台灣加入以國家為參加單位的國際組織」；翌日，民進黨中常會發表「於柯江會談後的聲明」，指出：「台灣為一已經獨立的主權國家……任何改變台灣獨立現狀的要求，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加以認可。」

在我看來，民進黨的這段聲明對消解台灣內部「台灣國族主義／中國國族主義」的對立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指標意義。民進黨以前的主張是：「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，台灣前途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舉決定」。在這樣的主張中，「台灣共和國」的政治立場和蘊藏在「中華民國」裡的「中國民族主義」形成了一種尖銳的對立，台灣社會內部也形成「台灣國族主義／中國國族主義」兩種集體意識緊繃的狀態。在這種緊張的狀態下，為敵對群體主張權利的任何論述，都可能遭受到壓抑，結果便形成錢先生所謂的「國族主義／自由主義」分歧的狀態。

在美國宣布「新三不政策」之後，民進黨在政策上所做的這項調整，其實已經使其國家政策變得和國民黨主流派相差無幾；從此之後，「台灣國族主義／中國國族主義」之間

如果再要發生對抗，應當是發生在兩岸之間，而不是發生在台灣內部。李登輝提出「兩國論」之後，立即獲得民進黨的熱烈支持，其道理即在於此。

李登輝的「兩國論」雖然曾經一度引起兩岸之間的情勢高度緊張，九二一震災的發生卻使得兩岸之間劍拔弩張的情勢暫時獲得緩解。只要李登輝總統任期屆滿之前，不再有製造兩岸緊張的大動作，我認為：不管誰當選下一任的台灣總統，在當前國際關係的形格勢禁之下，他一定得和對岸展開談判，重新尋求兩岸關係的合理安置。當「台灣國族主義／中國國族主義」在台灣社會內、外的對立情況獲得消解之後，台灣社會終將浮現一種要求清廉和效率的「反黑金」論述，來洗清李登輝時代的陳年積弊。這種「反黑金」論述雖然也可能引入西方式的自由主義論述，作為自己的思想武器，讓它們有較大的生存空間，不過其基本精神仍在於東方式的自由主義，而不是西方式的自由主義，這是學者在討論此一問題時必須加以分辨的。